

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

郭汉民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 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西学的输入与传播, 是近代思想发展的两大前提。救亡图存与争取国家富强成为先进中国人思考的核心问题, 社会的剧烈变化, 又促使人们的思想此呼彼应, 形成云涌风起的社会思潮, 百余年间社会思潮的主流沿着经世——变革——洋务——维新——立宪与革命的轨迹发展演变。

关键词: 晚清社会; 近代思想; 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 D0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1-0071-05

—

“康乾盛世”之后, 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晚清时代, 直到宣统退位, 历时 110 多年。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无论疆域的辽阔、国家的统一, 还是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 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盛世相比, 都毫不逊色。然而, 在世界范围内, 它却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潮流。还在康乾盛世尚未出现的时候, 在地球的西半部已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随后又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 彻底摧毁了传统社会的基础, 实现了社会的全面变革。“资产阶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 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时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43)}, 它将消灭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国家的孤立状态, 消灭各民族原先闭关自守状态所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 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英国确立起来。

英国资产阶级企图以廉价商品为重炮轰开中国大门。1793 年英国派遣玛戛尔尼使团访华, 1816 年又派阿美士德率团来华要求通商, 就反映了这种企图。这时清王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鼎盛状态中跌落下来, 进入了危机严重的衰世。中国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时候, 仍在旧的体制中缓缓运行。这种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以血缘关系与地缘组织相结合的宗族制度, 儒家思想为这一体制提供意识形态保障, 科举取士制度为地方士绅提供了进入官僚体系的途径。这种旧体制经过长期运行已臻于完善, 如无来自外力的强大冲击, 这种体制很难发生变革。即便改朝换代, 整个社会仍然还会在旧的体制下继续运行。

鸦片战争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强大冲击。“中国皇帝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鸦片一引者注), 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 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帝国, 不顾时势, 仍然安于现状, 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 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 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在这场决斗中, 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 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

收稿日期: 2003-11-12

作者简介: 郭汉民(1945-), 男, 河南省平顶山人,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2](262)}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马克思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264)}。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旧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力;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富强,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曾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始则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继则以西方的富强为参照系,比照中国,提出维护民族独立、改革社会弊端、争取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种种主张、方案,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思想。大体说来,鸦片战争前后,这种社会思想还是传统的,仅仅反映出向近代发展的某种趋势。而自19世纪70年代,即同治光绪之交开始,社会思想即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之后,此种色彩越来越明显,先进思想家们从倡导“变法”、“维新”到宣传“民权”、“自由”、“平等”乃至“立宪”、“民主”和“共和”。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想即是晚清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生动反映,也是转型过程的必然产物。

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嬗变过程。经济上要逐步实现工业化,政治上要逐步实现民主化。文化上要逐步实现多元化,使之具有多样化,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要实现近代转型更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晚清时期,在外力的推动和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它并没有完成社会转型,但毕竟是在先进中国人的求索与奋斗中向着近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并且为最终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准备了多方面的前提。近代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种前提

之一。

二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3](537)}晚清中国所出现的新经济、新阶级和新式政治斗争为近代思想和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凭借着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件所赋予的特权,开始将中国作为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为了抵制列强侵略,并“稍分洋人之利”,同治年间,中国兴办了一系列官办、官督商办的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多少带有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性质,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虽然微薄但却重要的初基。同治末年起,上海发昌机器厂和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先后创建,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先声。此后这类具有活力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在整个光绪朝代和宣统时期,40多年中先后经历了初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发展两个阶段,在丝、火柴、面粉、轧花、造纸、制茶、玻璃、碾米、水泥和挖煤、采矿、轮船、铁路等行业中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创办的近代企业前后达586家,其中在清末的10年中即创办了402家,呈现出方兴未艾、逐步繁荣的局面。尽管它不过是小生产汪洋大海中的点点绿洲,但却是新的社会经济。诚如毛泽东所说:“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来说,它是新经济……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产生的。”^{[4](656)}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投资和经营这类企业的地主、官僚、商人、买办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随着新式教育和留学热潮的兴起,又从旧式文人和青年士子中涌现出成群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使之一一般都充当着资产阶级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群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

由于晚清新经济的发展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特别是甲午战后,出现了诸如变法维新、拒俄反美、保护利权、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新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这些斗争既与旧式农民战争和民众的自发反抗有着明显的区别,也与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盲目排外划清了界限。

晚清中国带有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想就是上述新经济、新阶级、新式斗争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

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的思想。但思想理论的发展如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即是说,它必须凭借先前已有的思想资料才能得以发展。任何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理论,都必须“从已有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51](56)}意识形态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思维着的人们从纯粹的思维中得出的。这种纯粹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思维,就是他先辈的思维。先辈们思维所留下的思想资料是思想发展的前提。经济本身在思想发展中并不创造新的东西,它的决定作用只是间接地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61](468)}。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81](249)}晚清中国的社会思想主要是同两种观念材料相结合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思想,一种是西方近代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纷繁复杂、博大精深,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如民本思想、重民思想、平等思想、大同思想、分权思想以及变易观念等等,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象纲常伦理之类。其精华部分虽然本质上不同于近代意义的民主思想和进代理论,但却也与后者不无灵犀相通之处。它成为近代先进思想家们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接受西方思想的起点,也成为中西思想文化交融的结合点。

西方近代思想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样博大精深,纷繁复杂。从自然科学到社会政治经济学说,从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商品不断传入中国,即所谓“西学东渐”。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并不断走向世界,引进西学,输入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进化论和民约论,适应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得到广泛传播,为先进中国人寻找救国真理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促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更新与换代。过去,中国的士大夫不知道除华夏之外,还有世界;不知道除儒学之外,还有学术;更不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外,还有华盛顿拿破仑。西学的输入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诚如梁启超所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81](52)}

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两个源头,西学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融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此外,晚清社会变化的急剧和复杂性,也给中国近代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晚清社会的发展变化空前剧烈。从嘉道之际到宣统退位百余年中,发生过多次列强侵华的战争,发生过多次反抗外敌入侵和清朝统治的战争,各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为了中国的命运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救时济世的方案,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社会变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次战争的创伤还未平复,另一战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一次斗争和变革刚刚失败,另一次斗争和变革又在酝酿之中;一批志士倒下去,另一批仁人站起来。百余年中,举世震惊的历史事件就发生了至少十起,平均每七八年就有一次。这种变化的剧烈性在我国古代是没有的,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少见的。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原有性质,使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向上发展的半封建过程与向下沉沦的半殖民地过程交织在一起。而且,西方社会经过几百年漫长过程逐步形成的各种思想、观点、理论、学说,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都像潮水一般流入中国思想界,使中国近代思想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全程,使得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没有可能进入深入的理论思辨去构筑系统完整的思想系统,一代富有作为的先进中国人研究和提出的大都是一个一个孤立零碎的救时方案,不论宣传维新或革命的著作都带有“急救篇”的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带着明显的不成熟性。但是他们的救时主张在一定时期却往往不谋而合或者此呼彼应,形成一种带趋向性的社会思潮。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社会矛盾,多种阶级力量,多种思想资料,不能不产生多种社会思潮。晚清中国思想史上缺乏伟大而深邃的理论著作,社会思潮却云涌风起。这是晚清思想史的重要特征,也是晚清社会奇特的人文景观。

三

梁启超曾给“思潮”下了定义,其定义包含如下几层意思:其一,形成潮流的思想本身必须确有价值,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其二,反映时代要求的思想主张,其发展受到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即“环境之变迁”,二是主观的意愿与情感,即“心理之感召”,其“进路”大体一致,“同趋于一方向”;其三,在同一历史时期,反映时代要求的思想主张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呼应”,其势汹涌澎湃,像潮水一般,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与气势;其四,每一思潮都有一个兴起、发展、高涨与低落的演变过程。

晚清时期的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由于资本主义的产生,由于西方的东渐,由于社会转型中的

复杂状态,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和文化挑战。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走出封闭,追赶先进,改造中国,走近现代化道路,成为当时中国的中心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晚清思想界先后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涌现出各式积压样的社会思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思潮愈益变得丰富多彩,到了清末,更成林林总总,波澜壮阔之势。大体说来,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经过了如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嘉庆道光时期,亦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嘉道名臣陶澍、林则徐、贺长龄为代表的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以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为代表的学者和思想家,共同倡导“通经致用”和社会改革,推涌起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经世思潮揭露社会积弊,主张“更法”与“改革”;关注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谋求“筹边”与“筹海”。虽然这一思潮并未越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范畴,却带有鲜明的爱国性质与进步意义。其开眼看世界的趋势,架起了从传统思想走向近代思想的一座桥梁。

第二个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亦即19世纪5060年代之交。这段时间虽然短暂,却很重要。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入侵,使清王朝遭受空前的内忧外患,与之对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与在历经一场内讧的浩劫之后陷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而在咸同之际,来自清朝统治集团的冯桂芬完成《校邠庐抗议》,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翰林郭嵩焘向咸丰提出“通下情”和了解外情的建议;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人物之一洪仁玕提出效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晚清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学位的留学生容闳主张将“西方文明之学术”输入中国,使中国得以“维新”和“复兴”。这些人虽然政治取向、教育背景和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时代要求,即中国必须效法西方,走近现代化之路。

第三个时期是同治、光绪年间,亦即19世纪60-90年代。这是西方列强加控制中国的时期,是西学东渐重新启动的时期,是同光新政时期,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初步兴起的时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潮是洋务思潮和从洋务思潮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潮。洋务官僚奕訢、文天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沈葆楨、张之洞等倡言于上,进步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陈虬、汤震等人纵论于下,大办洋务,坚持开放,师夷长技以求强,工商立国以求富,变更科举以求才,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大力引进西学以为用,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思潮的主流。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初步兴起和先进中国

人对西方富强本原认识上的深化,原先倡导洋务的一部分代表人物,主要是其中的一批思想家开始提出比洋务思潮基本主张更进一步的要求:一是主张护商富民,发展民营企业,批评官督,支持商办;二是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民共主”,建立“议院”制度,从而显示了比洋务思潮更为激进的色彩,反映了初步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第四个时期是光绪中后期甲午至癸卯间,亦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1903年,前后历时8年左右。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空前丧权辱国,使得举国震动,大梦惊醒,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朝野上下言变法者乃纷纷。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主要代表的维新志士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奔走呼号,除向皇帝上书呈请变法外,还创报刊杂志,办学堂学会,大造维新舆论,主张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兴民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力倡改革,加上年轻的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之君,力图有所作为,支持维新志士的活动,使维新思潮迅速发展并高涨起来。虽然它在政治上的成就不大,但却是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对文明古国的社会转型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维新思潮以戊戌政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后这一思潮并没有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由于导致维新思潮高涨的那些历史条件继续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维新思潮在短暂的低落之后又高涨起来,并在思想理论上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以梁启超为代表,这一思潮通过自己的舆论阵地《清议报》、《新民丛报》和留日学生中的大批报刊,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人文科学知识和西方前辈们的历史,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诸如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进行改造,推陈出新,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倡民权、自由、立宪、宣传国家思想,培植国民精神。这与正在兴起的革命思潮相辅相成,为不少青年志士从爱国维新走向反清革命准备了一块跳板。

第五个时期是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即20世纪初的七八年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这时,为改变自己的形象以适应世界潮流的清政府不得不推行变法新政和预备立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随着新式教育和留学热潮而产生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亦开始崭露头角。西学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进化论、民约论为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1904年日俄战争的结局,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专制的大国沙俄,专制政治不能生存于20世纪更成为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君主立宪与反清革命两大思潮同时并起,分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的愿望。前者以梁启

超 杨度、张謇、汤寿潜等人为代表, 宣传立宪救国、政党政治、国会政治、责任内阁、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以及君主不负责任等宪政理论, 发起接二连三的国会请愿运动, 希望通过和平改革, 变君主专制政治为君主立宪政治, 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后者以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人为代表, 宣传排满、光复、民主共和, 发动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 希望通过暴力载命,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建立民主立宪的中华民国, 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制度。这两种思潮构成清末社会思潮的主流, 其规模之大, 范围之广, 人数之多, 影响之巨, 在晚清思潮史上可以说都是空前的。这两种思潮虽然有分歧, 有矛盾, 甚至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改变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追求国家政治生活的某种程度上的民主化, 却是一致的。而且, 在革命派忙于暴动、暗杀这类“武器的批判”的时候, 立宪思潮却拿起“批判的武器”大规模的、系统全面地宣传西方的宪政理论, 批判君主专制, 批判清王朝“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的本质, 做了革命党人所忽视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两种思想共同冲击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基础, 而当清王朝压制立宪思潮、镇压国会请愿运动且违背立宪精神, 强行组织“皇族内阁”时, 也就人心丧尽, 将自己的统治置于空前孤立的境地。随后, 武昌起义, 各省响应, 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王朝只好在土崩瓦解之中退出历史舞台。

在辛亥革命时期, 围绕立宪与革命两大主流思潮, 还出现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 国粹主义思潮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以张謇为主要代表的

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论者, 主张以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提高国民和国家的竞争能力, 可视为立宪思潮的一翼。以章炳麟、刘师培为主要代表的人们, 倡言保护国粹, 振兴国学, 并从古圣先贤著作中发挥民族大义以从事反满宣传; 提倡无政府主义, 歌颂虚无党精神, 反对专制, 否定政府和一切权威, 主张人人平等, “人类均力”, 可视为革命思潮的一翼。

综上所述, 可知晚清百余年间, 社会思潮的主流沿着经世——变革——洋务——维新——立宪和革命的轨迹发展演变, 其发展步伐愈益加快, 其近代色彩愈益鲜明, 这从思想史的角度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4]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A].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5] 恩格斯. 反杜林论[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恩格斯. 致康·施米特[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7]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A]. 饮冰室合集[C]. (三十四), 中华书局, 1998, 影印本.

Late Qing society and it's trend of thoughts

GUO Han-mi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an)

Abstract: China was beginning to change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in Late Qing because of the proud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m economy and the western knowledge, which we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remises to develepe the modern thoughts. The key subject that the advanced chinese thought about was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and making it prosperous and strong. The quick change of the society compelled their thoughts to affect each other, forming a tremendous social trend. The main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in Late Qing developed from construction to transformation to westernization to modernization to constitution and Revolution, when the development became faster, it was mor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zation. In a wo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Late Qing society; the thoughts of modern times;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编辑: 颜关明]